

鲜为人知的“北京特科”

◇穆玉敏



陈康

告别陈康后，吴成方立即回北平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陈康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平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是特科情报人员的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子栋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

潘东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红色特工，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身份暴露

北京特科得到了一份情

间，就把中共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

张学良一直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让潘东周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里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这个人通6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牺牲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了。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有关人员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1934年秋冬，对北京特科来说是残酷无情的。11月7日，北京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捕，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我党损失空前的一次。

为了捣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经过紧张审问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押解到南京。随后，杨青林、刘子奇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子奇的妻子陈红在监狱临盆，产后惨死狱中。

从创立到被毁，短短几年时间里，北京特科全体成员怀着崇高的信仰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利用所能利用的条件，出生入死，果敢机智地为党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很多人没能等到革命胜利就为理想而献身。

由于环境残酷，性质特殊，北京特科成员人数绝不止上述搜集到的这些，北京特科成员的名单也许永远是残缺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沉睡在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里。

背景资料

关于“北京特科”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史事，是如何被收集、整理的呢？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穆玉敏为我们讲述了这一过程：

我是偶然发现那一箱子资料的。那年我参加北京警察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只要和历史沾边儿的东西都是我搜集的目标。那是一个被叫做“战备柜”的绿色铁皮箱，里面锁着北京特科的资料。

或许，战备柜里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是资料，只是零星记忆。1980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年8月就把健在上海中央特科的“老情报”们请到北京开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搞清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回忆没有被党史记载的事件。会上，来自上海的情报精英人物吴成方提了一条线索，他说，1931年6月20日，上海中央特科的陈康从上海到了天津，通过胡鄂公找到他，交给他一个任务，在北方组建上海特科的下属地方组织。他即在北平组建了“北京特科”，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

吴成方的话令与会者大为惊奇，人们都知道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特科或者中央特科，那是中共最早的情报间谍机关，却从未听说过“北京特科”。于是“北京特科”就成为这次座谈会的最大收获。

会后，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托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北京特科的来龙去脉。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和几位老警察接受任务后，开始了数年的调查。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当时处在幼年时期和地下状态，特别是情报工作，往往是口口相传，不留书面文字，北京特科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活动极为保密，再加上北京特科仅存在于短短的几年时间，亲历者和知情者很少，所以，调查进行得很缓慢。

但是，他们并没放弃，费尽周折，走遍全国14个大城市，查阅100多卷历史档案，找到了43名北京特科成员，最终认定吴成方和他领导的北京特科的确定在当时白色恐怖中的北方秘密活动了近五年。

于行前和几位老警察带着抢救的历史而归，却因故没能把获得的资料整理成册，实现填补党的情报战线一段空白的愿望，致使刚挖掘出来的北京特科史实，又被长期锁在战备柜里。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开战备柜，里面的资料大多是“老情报”们的被访记录，虽然支离破碎，却很珍贵。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又参照了党史、公安史等，最终把那些零星记忆串成了一条连贯的脉络。

我已经拂去历史尘埃，无权再让北京特科躺在历史深处，因为那条连贯的红色脉络上，除了一宗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更有一个个崇高不屈的英灵，他们虽不为人知，却始终默默地注视着现在，以先贤的目光。

“北京特科”

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由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组成，他们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

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康来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康和“王同志”秘密请到自己住处。不久，杨献珍到北平送情报时不幸落入魔爪，出狱后与“王同志”再没见过面，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辗转找到杨献珍了解这段经历时，杨献珍方知当年和自己同居一室的“王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养山时，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杨献珍向陈康汇报说，因为中共顺直省委被毁严重，天津已不具备重建条件，所以，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在北平刚刚成立。

胡鄂公带着赎金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康见了面。陈康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党的损失。”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平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是出色的领导者。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平，胡鄂公就找上了门。

胡鄂公把陈康来天津的目的告诉了吴成方。吴成方当即表示全力协助陈康在北方开展工作，并跟随胡鄂公直奔天津。

吴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平，因为他对北平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陈康表示同意。陈康到天津后，多方了解天津和北平的情况，认为特科建在北平比建在天津更有利。一则，原来设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几乎被毁，原地恢复困难太大，并且，新的中共顺直省委也建在了北平；二则，北平虽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各种资源依然雄厚，比在天津开展情报工作的优势明显。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向陈康：“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

陈康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科。”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康：“谁来领导呢？”陈康回答：“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陈康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陈康北上组建北京特科

1931年4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康，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钱壮飞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康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陈康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穿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康一家安全到达天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康，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一路确保陈康的安全。二是跟随陈康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塘沽，他们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陈康来天津开店做生意。住下后，陈康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

没想到，胡鄂公在陈康到天津的时候也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陈康赶往天津设法营救。

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当年住在天